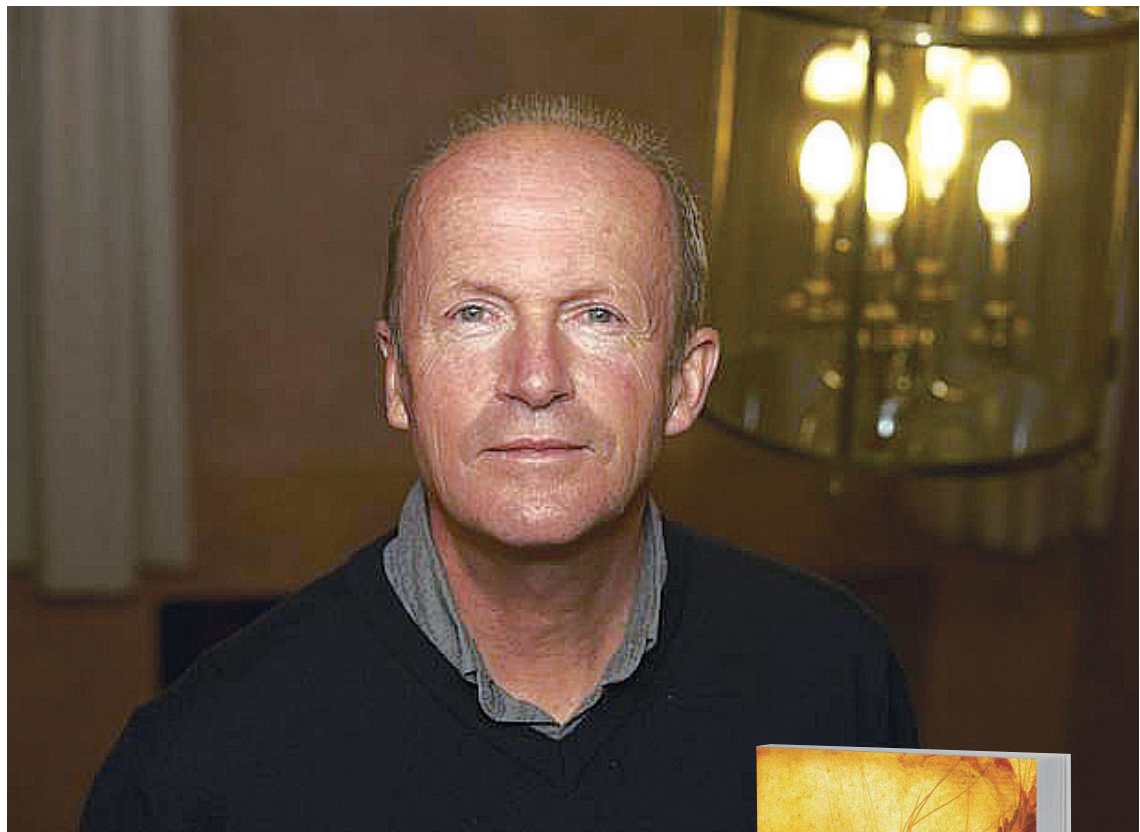


2015 国际 IMPAC 都柏林文学奖得主吉姆·克雷斯的《丰收》:

“克雷斯的幻境”中的现实关怀

□石平萍



吉姆·克雷斯特

用

“拿奖拿到手软”来形容当代英国作家吉姆·克雷斯特(Jim Crace, 1946-)，一点都不为过。长篇小说处女作《大陆》(Continent) 1986年出版后，一举囊括年度惠特布罗德处女作奖、大卫·海厄姆小说奖和《卫报》小说奖。之后克雷斯特保持优质高产的势头，创作了《石器礼物》(The Gift of Stones, 1988)、《阿卡狄亚》(Arcadia, 1992)、《遇险信号》(Signals of Distress, 1994)、《隔离》(Quarantine, 1997)、《往生情书》(Being Dead, 1999)、《魔鬼的食品柜》(The Devil's Larder, 2001)、《创世记》(Genesis, 2003)、《传染病屋》(The Pesthouse, 2007)、《后续的一切》(All That Follows, 2010)和《丰收》(Harvest, 2013)等10部长篇小说，赢得了10多个奖项，其中《往生情书》夺得美国书评家协会奖，《隔离》和《丰收》分别入围布克奖终选名单。《丰收》虽与布克奖再次抱憾擦肩，却也斩获了2013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2014年温德汉姆-坎贝尔文学奖和今年6月揭晓的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作为克雷斯的最新作品，《丰收》延续了他的一贯风格，精心打造了“克雷斯的幻境”以微妙传递现实关怀，所不同的是，这部“寓言小说”是以圈地运动为时代坐标反观现实世界。

一位立志成为“严肃政治作家”的“寓言作家”

克雷斯特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父亲12岁辍学，婚后开始自学，在他的带动下家里形成了好读书、亲艺术的氛围。父亲发现克雷斯特有编故事的天赋，便送了他一本《罗杰斯同义词词典》，鼓励他成为一名作家。克雷斯特成长于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社区，父亲是老派的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这个成长环境对他的文字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克雷斯特立志成为严肃的政治新闻记者或约翰·斯坦贝克、乔治·奥威尔那样的严肃政治作家，但他的首选始终是前者，原因在于他无法摆脱小说乃“资产阶级专属品”的观念，同时认定做新闻记者是“一种政治行为”，能改变读者的思想。故而他在《新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安妮，加州盘子》(Annie, California Plates, 1974)，两种机会接踵而至时，克雷斯特选择成为多家报刊杂志的专题报道记者。直到为《星期日泰晤士报》采写的新闻稿件因“政治干预”被弃用，克雷斯特才尝试创作一部曾经梦想的“现实主义政治小说”，此时他已年近四十。但在创作过程中，克雷斯特绞尽脑汁，竟然难以下笔，一筹莫展之际，他读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恶时辰》等作品，产生强烈的共鸣，受其启发转而创作长篇小说《大陆》，出版后深受好评，赢得众多奖项。从此，克雷斯特认为自己更适合做一位寓言作家，放下现实主义路线，遁入了评论家所称的“克雷斯的幻境”(Crace-land)。

概括来说，“克雷斯的幻境”有以下特点：一、故事背景远离现实，且几乎不出现具体的时间和真实的地名；二、故事情节不涉及真人真事；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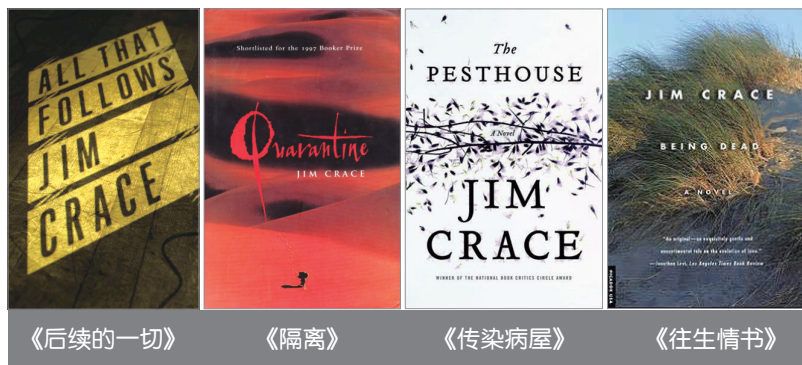
《丰收》英文版

教的功能由书中人物完成，作家决不直抒胸臆；四、书中立场往往模棱两可、摇摆不定。克雷斯特曾解释说他的小说创作作为嬉戏，带给他的是一种想象力自由驰骋的快乐。仔细分析，克雷斯的解释亦真亦假。很难说他的创作风格定位与曾经的“政治干预”造成的心理阴影有多大关系，但虚构和寓言的外衣足以保障他的创作自由；与此同时，他不可能完全抛弃初心，也不可能完全抛弃现实的考量。所以他的创作初衷往往包裹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只是这种关怀从真实的此时此地移置到了虚幻的彼时彼地。比如《大陆》旨在探讨西方国家对于第三世界的态度，却虚构了一个新的大陆作为故事发生地点；《石器礼物》意图反映经济萧条、撒切尔主义和工业全球化给工业城市伯明翰带来的沉重打击，但小说背景放在了石器时代，青铜器开始出现，即将淘汰石器时代的武器；《阿卡狄亚》的灵感源自伯明翰的市政建设以及克雷斯特夫人想离开城市、搬到海边居住的打算，但小说故事发生在虚构的英国城市；《隔离》同样意在批评撒切尔夫人的施政，却写成了在沙漠中流浪的耶稣的故事；《遇险信号》发生在1836年，其批判矛头指向的是当代英国信仰进步论的自由主义者；《传染病屋》为一些背景资料，描绘了一幅启示录图景，故事却发生在中世纪。此种错位如同一场乔装打扮的戏剧演出，为了吸引读者入戏，克雷斯特会阅读一些背景资料，了解彼时彼地的典型词汇，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巧妙的细节编排和堆砌，营造出身临其境、亦真亦幻的氛围。不仅如此，尽管克雷斯特一再拒绝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蓝本创作自传体小说，但他在《石器礼物》中对被砍断胳膊的主人公的描绘，受益于他在现实生活中对患骨髓炎而左臂残缺的父亲的了解；而《往生情书》涌动的情感暗流里，混杂着克雷斯特对父亲去世时因不信教而选择火化的愧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自我治愈性作品，他甚至于在《后续的一切》后花了两年时间创作一部“发自内心的私人”作品《群岛》(Archipelago)，希望在文字世界里实现与死去父母的团聚，受挫之后才写了《丰收》，这一经历差点令他退出小说界。

虽然评论家惯用“克雷斯的幻境”一词，仿佛此“幻境”如同《爱丽丝奇境历险记》中的“奇境”那般奇幻荒诞，连已故著名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也称赞克雷斯特是“一位具有梦幻般技巧的作家”，但在欣赏克雷斯特丰富想象力和高超虚构技巧的同时，在领略其作品情感真实和细节真实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克雷斯特是一位有着深切现实关怀的作家，“克雷斯的幻境”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样，与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部关于圈地运动的“寓言小说”

《丰收》中的“克雷斯的幻境”一如既往，难以辨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故事发生在圈地运动前后英国的一个小村庄。克雷斯特对耕地、羊皮纸制作、乡村礼仪和



《后续的一切》 《隔离》 《传染病屋》 《往生情书》

传统服饰的描绘毫无破绽，但对于具体的地点，克雷斯特则是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阿登森林的一角，“一个想象的、虚构的空地”。在克雷斯的笔下，这个小村庄几乎与世隔绝，实行封建庄园经济制度，洋溢着田园牧歌般的沉静美好、安宁和乐。这年春天，肯特老爷代替难产去世的妻子露西，成了庄园主人的爱戴。村民们耕种着庄园主的土地，虽然辛苦劳累，但足以维持生计，且有杂粮酿酒，还有闲情插科打诨、游戏作乐、传绯闻闻。故事开始时，村民们刚刚结束当年的大丰收，虽然收成不算乐观，他们依旧满心欢喜，期盼着第二天以推选“拾穗女王”的传统活动来庆祝丰收。克雷斯特在小说开篇引用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诗作《幽居颂》的第一节，作为全书的题词：“快乐之人，所盼所系/仅限数亩父辈祖产，/知足呼吸故乡空气/于自家庭园”，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了这个世外桃源里村民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这里的村民是安逸而迟钝的，当社会大变革不期而至时，他们几乎浑然不觉，对其夹带着的摧毁一切的力量更是准备不足。

除了间或提到的“绵羊”、“羊毛”等相关字眼，克雷斯特并未大肆铺陈圈地运动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大变革，他只是向这个封闭的村庄派来了三拨陌生人，而这三拨人都与圈地运动有关联。第一拨只有一人，即肯特老爷请来村里丈量土地、规划圈地、绘制地图、盘点人口的“鹅毛笔先生”(本名菲利普·厄尔)，他来的时候正值收成的最后一天，“我们用镰刀收割，他用画笔和鹅毛笔写写画画”；在村民眼里，他代表着“大世界”的商业文化，“面粉、肉和奶酪不像是这里按份平分到各家的食品柜里，而是称重量，量大小，而后出售”。同一天抵达的第二拨人是一家三口：贝尔达姆太太和她的丈夫及父亲，他们是圈地运动的受害者，失去土地后逃难至小村庄，按照当地传统，在村民发现之前在地上搭起简易房屋、燃起炊烟，就能被村民接纳，定居下来。然而在他们点燃炊烟的同时，肯特老爷的府邸竟然失火，将马厩和鸡棚烧为灰烬。村民们兴师问罪，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强行剪去三人的头发，用颈手枷铐住两名男子七天作为惩罚，孰料没过两天贝尔达姆太太的父亲便戴着枷锁死去，贝尔达姆太太一怒之下杀了肯特老爷最钟爱的马以示报复。就在贝尔达姆太太的父亲死去的当天，第三拨人登场，他们是露西的堂弟乔丹老爷一行六人，由于露西死后没有留下子嗣，她所拥有的庄园府邸及土地依法由血亲继承。乔丹老爷此行的目的便是从肯特老爷手里收回财产，并重新圈地，将耕地改为牧场，饲养绵羊获取羊毛，美其名曰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为村庄带来“进步”与“繁荣”，正是他让肯特老爷请来“鹅毛笔先生”完成重新规划的工作。与视村民为“邻居和朋友”的肯特老爷不同，乔丹老爷阴险

狡诈、冷酷无情，村民们在他眼里不过是阻碍他实现宏伟蓝图的一伙刁民。他派手下四处搜寻杀马嫌疑人，给无辜者扣上“女巫”罪名，引得人人自危，纷纷逃遁。乔丹老爷如愿推行圈地计划，带着肯特老爷等人离开了村庄，肯特老爷的仆人瑟斯克则留守庄园，等待羊群的到来。故事的最后，贝尔达姆太太放火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瑟斯克也离开了村庄。田园牧歌般的小村庄从存在到毁灭，只用了短短7天，这也是上帝创造世界所用的时间，这种看似巧合的情节设计，是一种多么用心的反讽！

在这个故事里，圈地运动刚刚展开，羊群尚未到达村庄，牵涉其中的

各个阶层——封建庄园主、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全数登场，上演的除了“阶级斗争”戏码，还有更为精彩的人性大戏。克雷斯特擅用寓言中常见的抽象的时间、地点以及扁型人物，《丰收》中的人物完全可以与好主子、坏主子、忠仆、替罪羊、复仇者这些类型对号入座，因此不能说书中的单个人物将人性的多面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克雷斯特创造性地运用了忠仆瑟斯克作为叙述者，充当全书的意识中心，他的叙述视角时而是集体的，时而是个人的，从而将巨变来临之际整个村庄的行为与心理状态全面地呈现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人性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其黑暗面。如本屆都柏林文学奖评委会所言，沃尔特·瑟斯克“引领我们直奔这个村庄的黑暗心脏，那里潜伏着背叛、残忍、贪婪、懦弱和欲望，这些恶习一直以来与我们如影随形，并且永远无法摆脱，这部小说从而被赋予了现实意义”。克雷斯特“对人的了解简直不可思议”，窃以为这是克雷斯特作品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之一，毕竟人性深度始终是文学作品打动人的不二法宝。

除了人性层面的现实关照，《丰收》对现代民生也存一份关怀。《丰收》的创作缘起于克雷斯特的一次火车旅行：在前往伦敦的火车上，他看到了窗外圈地运动前的田埂和犁沟遗迹，当天在大英博物馆看到了一幅反映圈地运动时农民陷入困苦的水彩画，而后在回程火车上，又读到巴西农民的土地被强征用于种植大豆的新闻。“美与强占豪夺，两样东西同时包含在这样的风景图景里。”这就是《丰收》里关于土地的故事，“美与强占豪夺”，不仅发生在彼时的英国，也存在于此时的巴西。“我的作品需要这个。我有一个历史场景和一个可能的历史故事，我可以偷来用一用，但我必须看到与21世纪的关联”。《丰收》里的“强占豪夺”背后，是圈地运动所代表的铺天盖地、不可逆转的社会大变革。事实上，社会大变革影响下的变化中的社区，是贯穿《大陆》《石器礼物》《阿卡狄亚》《遇险信号》等作品的重要主题，是克雷斯特不断思索、不断深化探讨的文学命题。在《丰收》里，克雷斯特传达的信息是多重的：我们读到了“羊吃人”的惨剧，感受到了克雷斯特对商业贸易与资本主义的批判；我们读到了《失乐园》的故事架构，感受到了克雷斯的怀旧与感伤，“获得值得拥有的新事物，必定是以失去值得保留的旧事物为代价”；我们也读到了瑟斯克离开村庄时的不舍与决绝，感受到了克雷斯特对变革的乐观与憧憬……

作为21世纪的读者，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深切体会着“惟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这一哲学命题的内涵，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克雷斯的执念与感悟。这也许就是《丰收》这部“寓言小说”最重要的寓意。这也许就是“克雷斯的幻境”最重要的现实关怀。

我的阅读

凝眸帕斯卡尔

□武 歌

如今的阅读，能让人在精神平静中思考的书籍似乎越来越少。作家不断在小说中甚至散文、随笔中制造悬念、紧张、刺激，乃至将影视剧中最常见的“戏剧冲突”毫无节制地引进到文学创作中，悄悄的变成“电影版、电视剧版”的小说”。让小说更为好看，应该没有错误；甚至让散文、随笔更好看，也没有错误。诺尔曼·道格拉斯的游记《妖妇之土》、戴·赫·劳伦斯的意大利随笔等等，都是情节紧张而又精彩的作品。但在2015年的这个夏季里，我不想再阅读那些情节紧张的作品了。再紧张，能有生活紧张吗？再荒诞，能有生活荒诞吗？再滑稽，能有生活滑稽吗？再不可思议，能有生活不可思议吗？“文学创作”已经成为经常卡壳的一把老式机枪，倘若没有更大的精神承载能力，很难再射出具有生活哲理的思想之花。假如再不注入强劲的生活、生命之思考，它的命运轨道极有可能滑向枪械历史博物馆，继而成为玻璃罩内被观赏的一件展品。

我们早就应该读一点文学以外的书籍了。于是在那个手机时刻传播着各种惊诧信息的午后，偏僻书店角落的《思想录》突然绽放出明亮的光芒。帕斯卡尔沉静目光，穿过飘散着各种尘埃的岁月，讲述着几百年前朴素得近乎直白的真理和警言。认真聆听，会发现那些久远的“思想”对今天的生活依旧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帕斯卡尔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数学家。他生活在17世纪的法国，那时的法国仍是封建农奴制国家，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封建制母体之内滋长。帕斯卡尔随博学的法庭庭长父亲迁至巴黎后，经常出入科学家、艺术家聚集的学术集会，且又受到严格的教育，这为其未来的人生走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帕斯卡尔很小的时候就对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11岁就写出了关于声学的论文。随后又向几何学进军，16岁发表了著名论文《圆锥曲线论》。紧接着，18岁开始设计计算机，并根据齿轮转动原理，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计算六位数字加减法的手摇计算机。在以后的日子里，帕斯卡尔又在大气压力、流体静力学、真空理论等科学领域，创作出令人信服、具有开创性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

但帕斯卡尔真正的精神力作，还是《思想录》。这样的精神思考由科学家撰写，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精神。

我最喜欢的《思想录》中的一句话就是“雄辩是以甜言蜜语说服人，而不是以权威；它是暴君而不是国王”。但真正喜欢这句话的原因，是《思想录》的编著者布伦士维格对它的解释，“国王是合法的，而暴君是非法的；说服力的权威是合法的，但雄辩的甜言蜜语却足以破坏人的意志”。深思会发现《思想录》是挺直腰板说真话的，是藐视一切“非法的暴君”的，是敢于向权威发出挑战的。

《思想录》在合法的语境下，探讨生命中最无形但又引导人生之路上最为重要的仪器——思想。

以几何学的“点和面”理论来写就《思想录》的帕斯卡尔，不断用严谨的思考来点燃思想火花。“人必须认识自己，如这不能有助于发现真理，至少这将有助于规范自己的生活；没有别的比这更为正确的了”。帕斯卡尔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阐述的。比如他用科学的实践来验证生活中的哲理，“当人们习惯于使用推理的推论去证明自然的效果时，人们就不愿意在发现了好的推论时，再接受好的推论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即血液循环之可以用来解说为什么血管被绑扎起来就会发胀”。以医学常识做基础，说明某项理论判断的正确，这只有科学家能做到。这也正是《思想录》的有趣之处。

《思想录》是帕斯卡尔生前尚未完成的手稿。里面的篇章，有的已经完成，有的仅是一条标题，或是简单的提纲，由后世多人完成编辑。我阅读的版本是布伦士维格编著的，这也是世界上其他语种翻译时所最信赖的版本。

我喜欢布伦士维格所做的具有想象空间的标题。例如“由于我们脆弱的缘故而改变象征”，“没有一种耻辱使我们不可能获得善，也没有一种圣洁使我们不可能免除恶”，“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他们相信自己是罪人；另一种是罪人，他们相信自己不是义人”，“神恩的运动，内心的顽固，外界的环境”等等。

当然那些简单的提纲，比起标题，更能窥见帕斯卡尔的内

心世界，也更能完整呈现《思想录》的“思想”内核。比如帕斯卡尔在论述“人与自然、人的行为以及自我修养”的诸多关系中，使用了极为浅白的说理，他讲到令我们致命的常常是人类制造为自己服务的东西；而自然的大海又会因一块巨石而变化。最后他阐述道：“最细微的运动，都关系到全自然，因此一切都是重要的。在每一件行为中，我们还必须在行为之外，注意到我们目前的、过去的和未来的状态，并须看出这一切事物的联系。”最后，这位经常做各种科学实验的科学家指出人在自然界的行为必须“十分小心慎重”。

17世纪的警言并没有在三个多世纪之后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依旧在快乐地吧树林变成沙漠；把沼泽滩涂变成荒地；我们把鱼儿赶走，把鸟儿驱散，把蓝天遮上雾霾……接下来，我们还做什么？

在阅读《思想录》的这个夏季里，我还在把“创作的技巧”津津乐道地转述给旁人，还在苦思冥想一部小说怎样才能拥有“跌宕起伏”和“悬念丛生”，并为此煞费苦心。

我在做什么？

那日津城突起暴雨，我被阻隔在一家书店里。隔着宽厚的玻璃窗，望着狂风中已连成一线的雨丝，只是在想什么时候雨停，我才能皮鞋不湿的回家。30多年前的暴雨中，学徒工的我却能和师傅一起赤脚踢足球；如今却只能隔着窗遥想高尔基的《海燕》，四肢像巨石一样沉重，精神像磨盘一样难以转动。

写作者精神的衰败，导致写作精神的迟滞。不要追究身体的破弱，与身体没有任何关系。事实就是，当我面对一把猎枪，我敢赫然举起对着自己的头颅吗？我哪里敢议论别人，我只是叩问软弱的自己。帕斯卡尔在一个“象征性”的标题下面，列出的文字是——剑、盾。这两个字，仿佛两个硕大的问号，不眨眨眼地注视着世界。

我不是说所有的写作都要放弃“技巧”，只要一味的“思想”。正像帕斯卡尔论述的那样，“为了防止有恶人出现，就必须杀人吗？那就是以两个恶人代替一个恶人了”。但我们的确应该关注“思想”了。

我极为喜欢罗兰·巴特的一句话：“从人的身上读出书来。”我想把罗兰·巴特的这句话再改编一下，“从书中读出人生”。在这个迷雾一般的夏季里，阅读《思想录》，凝眸帕斯卡尔，就像在寻找一座沉思顿悟的大山。

深山，在每个人的心中。